

文 本

水 经 注 图



【北魏】酈道元 原著

【清】汪士铎 图

陈桥驿 校释

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文 本

水 经 注 图

【北魏】郦道元 原著

【清】汪士铎 图

陈桥驿 校释

山东出版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水经注图 / (北魏) 酈道元原著; (清) 汪士铎图; 陈桥驿校释. —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03.5

(中国古代画本文化经典丛书)

ISBN 7-80603-710-1

I. 水... II. ①酈...②汪...③陈... III. ①水经注—注释②水经注—插图③古水道—历史地理—中国
IV. K928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6631 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

装帧设计 蔡立国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

电 话 总编室 (0531) 2060055-5420

市场部 (0531) 2053182 (传真) 2906847

网 址 <http://www.sd-pictorial.com.cn>

<http://www.sdh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c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 格 150 × 250 毫米

18 印张 160 幅图 195 千字

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-6000

定 价 4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。

郦学概论

(代序)

陈桥驿

引言

在整个地球上，除了高山和荒漠等地区外，绝大部分地面都被大小河流所网络。河流滋润大地，哺育生灵。所以郦道元在《水经注序》中说：“天下之多者，水也，浮天载地，高下无所不至，万物无所不润。”在古代，人类文明往往与河流联系在一起。以我国的六大古都为例：西安为泾、渭、灞、浐、沣、镐、潏、涝八水所围绕，即所谓“八水绕长安”；洛阳按《洛诰》是在洛水的支流涧水和瀍水之间经过占卜而兴建的都城；开封在其全盛时代，即北宋的东京城，穿城而过的河流就有汴河、惠民河、五丈河、金水河四条；北京为永定河、潮白河、北运河、拒马河等所环绕，而西山水源，又在城内形成什刹海、北海、中南海等许多湖泊；南京在长江和秦淮河之交；杭州在钱塘江和大运河之交。这说明了河流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。

正是由于河流的重要性，所以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，大量的见于古籍记载。《五藏山经》是《山海经》成书最早的部分，是我国最早的地理书，大概撰于战国时代，里面已记载了一百多条河流的名称。《禹贡》是比《五藏山经》稍晚的地理著作，记载了包括江、淮、河、济所谓“四渎”在内的三十几条河流，并且还记载了今洞庭湖、鄱阳湖、太湖等九个大湖。以后如《说文解字》记载的河流为数更多¹，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记载的河流，不仅数

量多，描述也更为详细。上述古籍当然不是记载河流的专著，它们既记载河流，也记载其他地理事物。不久以后，记载河流的专著相继出现，这种书称为《水经》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：“桑钦《水经》三卷。”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记载河流的专著。桑钦是西汉成帝时代人(公元前一世纪末)，因此班固撰《汉书》时已能见到此书，在《地理志》中引用了六处。由于班固引用此书时只说“桑钦言”、“桑钦以为”等，未指《水经》书名，所以后世尚有不同意见。不过《汉志》所引六处，其内容恰恰就是绛水、漯水、汶水、淮水、弱水、易水等六条河流，因此很可能就是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《水经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：“《水经》三卷，郭璞注。”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著录：“《水经》三卷，郭璞撰。”《旧唐书》“撰”字当从《隋书》作“注”字。宋《通志·艺文略》著录：“《水经》三卷，汉桑钦撰，郭璞注。”《通志》的著录比《隋书》、《唐书》完整，说明桑钦所撰的《水经》，到晋代由郭璞作注。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《水经》和《水经注》。可惜二书均已亡佚，内容除《汉书》引及者外，其余不得而知。

到了三国时代，另一种《水经》接着问世。此书不知撰者，也不详具体年代。清人根据书内地名考证：“《涪水》条中，称广汉已为广魏，则决非汉时；《钟水》条中，称晋宁仍曰魏宁，则未及晋代。推寻文句，大抵三国时人。”²这项考证明白可信。但以后有人作其他解释，甚至提出经注同出一手，即均由酈道元所撰，于事甚属无稽，可以不论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另有著录：“《水经》四十卷，酈道元注。”新旧《唐书》著录与《隋书》同，这就是今日通行的《水经注》，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。

《水经注》的撰述与流传

《水经注》为北魏酈道元(? ~527年)所撰。道元字善长，涿州(今河北涿县)人。他出生于一个世代官宦家庭，一生中曾任北魏书侍御史、颍川太守、鲁阳太守、东荆州刺史、河南尹、御史中尉等职，最后于关右大使任上在阴盘

驿亭(今陕西临潼附近)为叛将萧宝寅所杀害。酈道元毕生勤奋好学,《魏书》和《北史》本传都说他“历览奇书”。他在一生戎马倥偬之中,竟撰成《水经注》这样一部巨著(今本尚有三十四万余字),被后世称誉为“圣经贤传”³和“宇宙未有之奇书”⁴。此书撰述,究竟始于何时,成于何年,很难估计。全书中出现的最后一个年号是延昌四年(515年),酈道元被害于孝昌三年(527年),所以大体而言,此书当成于从北魏延昌到孝昌的十余年之中。

从酈道元被害直到隋一统,中间经过半个多世纪,洛阳曾数遭兵燹,庐舍为墟,但此书却奇迹般地得以保全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四十卷仍是完璧。隋时修类书《北堂书钞》,此书已被引用。唐初官修类书《初学记》,引此书尤多。后李吉甫主纂《元和郡县志》,亦常以此书记载为据。《唐六典》说:“桑钦《水经》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,江河在焉,酈善长注《水经》,引其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。”⁵这是当年卷帙完整的全部《水经注》的规模。宋初,此书仍完整无缺。官修类书《太平御览》及地理书《太平寰宇记》,二书规模均甚庞大,所引《水经注》更多。此后,北宋类书如《书叙指南》,全国总志如《元丰九域志》⁶,南宋类书如《玉海》,地理书如《輿地纪胜》、《方輿胜览》等,莫不大量引用《水经注》的词句。不过在景祐年间,北宋朝廷书库崇文院整理书籍,进行编目(《崇文总目》),发现此书已亡佚五卷,《水经注》从此成为残籍。所以在《御览》和《寰宇记》以后,各书所引多出自残本,宋初引及的滹沱水、泾水、洛水等河流,均在亡佚的五卷之中,以后就很难见到了。

从隋唐直到宋初,《水经注》仅在官修书籍中引及,私家诗文绝未见到,可见当时此书只在朝廷收藏,未曾流入民间。陆龟蒙在唐末有诗句“《山经》《水疏》不离身”⁷,此《山经》当然是《山海经》,但《水疏》并不能断言就是《水经注》。陆龟蒙撰诗甚多,却绝无来自《水经注》的诗句,所以无法肯定在陆氏时代,酈注已经流入民间。到了北宋中期,情况就显然不同。苏轼《寄周安孺荣诗》云:“嗟我乐何深,《水经》亦屡读。”苏轼诗中的《水经》即是

酈注，这有他的其他文章可以佐证。他在《石钟山记》一文中说：“酈元以为‘下临深潭，微风鼓浪，水石相搏，声如洪钟。’”⁸说明他确实“屡读”《水经》。北宋的另一学者曾巩，也在他的著作中引及《水经·沔水注》的白起渠⁹。所以此书在当时已流入民间，可以无疑。也正是因为深藏朝廷书库的此书能流入民间，为此书的传播与酈学的形成、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机会。

在雕板印刷盛行以前，书籍的流行主要依靠传钞。《水经注》当然也是如此。一部三十多万字的著作，经过多次的辗转传钞，不仅错漏满篇，而且依靠传钞流传，数量毕竟有限，很容易因水火兵燹而毁灭，终至亡佚。北宋后期，随着雕板印刷的发展，《水经注》的第一种刊本，即成都府学宫刊本问世。这个刊本只有三十卷，比《崇文总目》著录的更少五卷，说明绝非宋初的本子。这个刊本出现后不久，到元祐二年(1087年)，学者才又从何郯(字圣从)的藏书中得到一种较好的钞本，以此本与成都府学宫刊本对勘，内容增加了十分之三，凑成四十卷之数，这就是《水经注》的第二种刊本。这两种刊本都早已亡佚。由于明人吴琯曾以元祐刊本作底本，刊行了一种校本，至今尚存，因此，元祐刊本的规模，通过明吴琯刊本尚大致可见。元祐刊本虽然也并非佳本，但是，这些刊本的出现，使《水经注》的流传开始有了两条途径，除了传钞仍然继续外，效率比传钞高得多的雕板印刷，使《水经注》的流行和学者研究此书的条件，都有了很大的改善。

酈学的形成与三大学派的发展

《水经注》一书虽然内容丰富，牵涉广泛，但是自从隋唐以至北宋，学者在此书上所下的功夫无非是剪辑它所记载的各种资料。有的把这些资料进行分门别类，收入各种类书，如前已述及的《北堂书钞》、《初学记》、《御览》、《书叙指南》等；有的摘取其片言只语，作为其他书文的注释，如唐初司马贞作《史记索隐》、章怀太子注《后汉书》等等；有的则把酈注资料按地区分类，录入全国总志或其他地理

书，如《元和郡县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元丰九域志》等等。所有这些，不过是对《水经注》的初步研究。这样的研究，对酈注本书无所发明，也不可能使《水经注》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。

南宋时代，金礼部郎中蔡珪¹⁰撰《补正水经》三卷，书虽亡佚，不知内容，但此书尚存元至顺刊本欧阳元的序，序云：“其详于赵、代间水，此固景纯之所难；若江自浔阳以北、吴淞以东，则又能使道元之无遗恨者也。”¹¹说明内容多有补正酈注之处。又此书苏天爵跋云：“（至顺三年）七月归至岳阳，与郡教授于钦止览欢山川，钦止言洞庭西北为华容而县尹杨舟方校《水经》，念其文多讹阙，予因以《补正》示之，今所刻者是也。”¹²据此，则蔡书还可能对酈注有所校勘，他对于《水经注》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。在《水经注》研究中形成酈学这样一门包罗广泛的学问，蔡珪的研究是其嚆矢。

明代以后，由于雕板印刷业的发展，新的《水经注》刊本不断涌现，比较著名的有嘉靖十三年（1534年）的黄省曾刊本，万历十三年（1585年）的吴琯刊本。这些刊本多以北宋景祐以后的本子作底本，稍加校勘就匆促付刊，经注混淆，错漏连篇，所以多非佳本。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刊行的《水经注笺》，是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《水经注》版本史上的第一部佳本。此本由朱谋玮所校勘，常被简称作《朱笺》。朱字郁仪，是明宗室，受封为镇国中尉。他一生力学，《明史》本传说他“闭户读书”。他对《水经注》的研究功力尤深，曾和当时著名的酈学家谢兆申（耳伯）、孙汝澄（无挠）、李克家（嗣宗）等，经过长期的商榷校讎，完成了此书。顾炎武称道此书为“三百年来一部书”¹³；王国维也赞扬“朱氏之笺，实大有功于酈书”¹⁴。所以朱谋玮不仅开创了酈学研究中的第一个学派即考据学派，并且大大地丰富了《水经注》研究的内容，奠定了酈学繁荣发展的基础。考据学派在清初继续发展，出现了诸如孙潜、刘献廷、沈炳巽、何焯等一流学者。他们的辛勤工作，使《水经注》逐渐从残籍走向完璧。到了乾隆年代，这个学派终于出现了登峰造极的局面。三位酈学大师全祖望、赵一清、戴震，各以他

们的精湛校本，为郦学研究创造了灿烂的前景。特别是成书最晚的戴震校本，即武英殿聚珍版本，吸取了全祖望、赵一清和其他一切佳本如《永乐大典》本和《水经注笺》等的成果，成为此书从北宋景祐缺失以来的最佳版本，除了景祐缺失的五卷无法弥补外，其余基本上已经恢复了郦注的原貌。考据学派是郦学研究中的基础学派，学者们区分经注，校勘字句，追索缺失，精详注疏，使长期来错漏累牍，不堪卒读的郦注，又逐渐成为完璧，为郦学研究提供各种理想的佳本，从而促进了郦学的发展。

晚明形成的另一个郦学学派是词章学派。这个学派由于崇祯二年(1629年)钟惺、谭元春评点本《水经注》的刊行而成熟。钟、谭二人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学家和诗人。由于他们都是竟陵(今湖北钟祥一带)人，他们的文字风格被称为“竟陵体”，名重一时。谭元春在此书序言中说：“予之所得于郦注者，自空濛萧瑟之外，真无一物，而独喜善长读万卷书，行尽天下山水，囚捉幽异，掬弄光彩，归于一绪。”他们是从文学的角度研究《水经注》，着重于总结此书在文学上的成就。由于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的撰述中表现了他的高度文学素养和卓越的写作技巧，唐宋以来，人们在这方面已经有了较大的重视。明末学者张岱说：“古人记山水，太上郦道元，其次柳子厚，近时则袁中郎。”¹⁵明代中叶的学者杨慎，就曾把郦注中的出色描写摘录成编，以供学习和欣赏¹⁶。不过这些学者只是列举《水经注》的优美词句，而钟、谭评点本则能把这些优美词句从文学的角度加以品评，将郦注在词章上的成就提高到理论。这个学派的贡献，不仅是让后人观摩和吸取《水经注》的文学精华和写作技巧，而且把《水经注》这样一种记载河流的专著，评点成为一部供公众欣赏、享受其优美文字的作品。因此，词章学派是郦学研究中的欣赏学派。这个学派研究的重点，当然并非郦道元撰写此书的本旨，但他们的研究，触及一般读者的普遍兴趣和人们的精神享受，十分有利于《水经注》一书的推广，也同样有利于郦学的发展。

郦学研究中的第三个学派是地理学派。《水经注》一书的地理学性质原是众所共见的。因此，从唐《元和郡县志》

起,历代修纂全国总志和其他地理书,《水经注》往往被列为重要参考文献,引用其中的大量资料。清初以来,不少学者如顾祖禹、胡渭、刘献廷等,都在他们的地理学研究中利用过《水经注》,而黄仪、董祐诚、汪士铎等,都曾绘制过《水经注图》。由此可知,郦学研究中的地理学派,溯源甚早,而且流传广泛,可是工作都比较零星,成果也未臻完美。所以,尽管在地理学研究中结合郦注的学者先后相继,代有其人,但是却未能形成一个学派。直到晚清,由于杨守敬(1839~1915年)与他的学生熊会贞(1859~1936年)在这方面的一系列工作,终于形成了郦学研究中这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地理学派。杨守敬字惺吾,是晚清著名的地理学家。他的地理学与王念孙、段玉裁的小学、李壬叔的算学,曾被誉为清代的“千古绝业”¹⁷。他于光绪十九年(1893年)起开始《水经注》的研究,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在熊会贞的襄助下完成了《水经注疏》初稿八十卷,因篇幅过大,同年先刊印《水经注疏要删》四十卷,光绪三十二年又刊印《补遗》四十卷,另有《续补》四十卷,稿成未刊。另外,他在光绪二年(1876年)开始付刊的《历代地理沿革图》的基础上(全图共六十九种),编绘了《水经注图》一套,全图八册,采用古今对照,朱墨套印的形式,于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刊行。《水经注疏》初稿的完成和《水经注图》的刊行,是我国郦学研究中地理学派成熟的标志。尽管长达一百多万字的《水经注疏》仍然包含着大量考据的成果,杨、熊二人在校勘上也有重大的贡献,但郦学界已经开始发现,考据和校勘并不是郦学研究的主要目的。正如陈运溶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在《荆州记序》(见《麓山精舍丛书》)中所说的:“近世为《水经》之学者,又皆校正字句,无所发明。”要在郦学研究中有有所发明,就有必要在考据学派所提供的基礎上,从事《水经注》内容的研究和发挥。这中间,对此书所包罗的大量地理学内容的研究,当然是非常重要的。因此,地理学派是郦学研究中的实用学派,它必然要和乾隆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派一样,获得重大的发展,推动郦学研究的前进。

杨守敬于民国四年(1915年)去世。当时,《水经注疏》

全稿尚未最后修定。熊会贞继承师业，继续修订此书，“又二十二年，书凡六、七校，稿经六次写定”¹⁸。熊会贞于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去世，此书最后定稿不幸被人私卖而不知下落¹⁹。但熊氏在修订过程中曾钞出若干钞本，其中一本最后为中国科学院所得，已由科学出版社影印，于1957年出版；另一本为台湾省中央图书馆所得，也已由台北中华书局影印，于1971年出版。这两本都是酈学史上注疏最详尽的酈注版本，它们代表酈学地理学派迄今为止的主要成果。

酈学史上的大论战——赵、戴《水经注》案

前面已经提到，乾隆年代是我国酈学史上的黄金时代。三位酈学大师全祖望(号谢山，1705~1755年)、赵一清(号诚夫、字东潜，1709~1764年)、戴震(字东原，1723~1777年)各以他们的校本：七校《水经注》(简称七校本)、《水经注释》(简称赵本)、武英殿聚珍版本《水经注》(简称殿本)著名于后世。三本之中，最后完成而却最早刊行的是殿本。戴震于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奉诏入四库馆，次年就校定了《水经注》，由武英殿刊行。赵本成稿于乾隆十九年(1754年)，比殿本早二十年；但直到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才得刊行，比殿本晚十二年。四库开馆之时，朝廷曾颁令全国采进藏书。赵书钞本由浙江巡抚呈进，有《四库提要》著录可查²⁰。因此，早在乾隆四十五年(1780年)，四库馆内已有戴书袭赵的议论。当时，戴震去世已经三年，全、赵当然早已物故，但他们的书都尚未刊出，还是戴书独行的时候。今上海图书馆所藏孙沅鼎校殿本中，有一段孙在当年所写的跋语：

吾友朱上舍文藻²¹自四库总裁王少宰²²所归，为予言：此书参用同里赵口口(按当是诚夫或东潜二字)一清校本，然戴太史无一言及之。

这条跋语的关键当然是“然戴太史无一言及之”一句。因为在著述中参用他人之书，这是古今皆然的事。但参用而不著一言，这就成了剽袭，是一个道德和人格的问题了，

到了乾隆五十一年，赵书在开封刊行问世。学者所见此书与殿本在体例和内容上“十同九九”²³，于是舆论哗然，而戴震的学生段玉裁首先发难。因为赵书在刊行以前，赵子载元曾委托梁履绳、玉绳兄弟就原稿做过一番整理，时履绳已物故，段就致书玉绳，询问他们在整理赵书时，有否“据戴本以正赵本”？当时梁有否覆信不得而知，但梁去世后在其文集《清白士集》中未收覆书，所以有人认为当时梁未曾覆书，即是默认，则赵书确有袭戴之事²⁴。但也有人认为，“大约梁之覆书，不过告以实未与闻而已，其书既不足存，自不复入集。”²⁵所以此事实已无法核实。

但不久以后，魏源于道光年间撰成《赵校水经注后》²⁶一文，提出了戴书袭赵之说。另外，由于戴震称他在四库馆内校书，主要依据外间无法看到的《永乐大典》本《水经注》。后来，张穆于道光间也在翰林院看到了此大典本郦注，发现戴所谓据大典本校勘是假，而抄袭赵书是真²⁷。从此，论战扩大，而认为戴书袭赵者居多。到了晚清，这个案子已经闹得满城风雨，不可收拾，实际上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郦学研究。因此，某些有识之士，希望各方能平息这场论战。王先谦在光绪十八年(1892年)刊行合校《水经注》，他在卷首《例略》中说：“诸家聚讼，若段玉裁懋堂、魏源默深、张穆石舟，各执一词，存而不论可也。”民国以后，由于论战迄未稍息，梁启超也曾试图出面调停，使这场时旷日久的论战得以休止。他说：“吾今试平亭此狱，三君(按指全、赵、戴)皆好学深思，治此书各数十年，所根据资料又大略相同，则闭门造车，出门合辙，并非不可能之事。”²⁸1935年，《永乐大典》本《水经注》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出版，张元济也在此书的跋文中提出结束论战的呼吁。他说：“今何幸异书特出，百数十年之症结，涣然冰释，是书之幸，亦诸读者之幸也。”

但是，论战并不因这些呼吁而休止。民国以后，学术界许多知名之士，都先后卷入这场争论。例如王国维责备戴震：“凡此等学问上可忌可耻之事，东原胥为之而不顾。”²⁹余嘉锡则指出戴震的著作，素来就是“改头换面，略加窜点，以为己作。”³⁰孟森认为“东原之所为，实为学林所应

公愤”³¹。郑德坤根据大量考证，论定：“戴震剽袭赵一清、全祖望之罪名，虽百喙不能解之，而《水经注》赵戴公案可以判决矣”³²。这场论战原由赵书袭戴开始，最后由于情况判明，戴震终于落得个四面楚歌的境地。

民国以后仍然站在戴震一方的学者已是凤毛麟角。在日本，森鹿三(1906~1980年)是一个特例。森是日本的郇学权威，他于1931年在京都《东方学报》第三册发表了一篇《关于戴校水经注》的文章，竭力推崇戴震，并举出多种证据，说明他未袭赵书。尽管他的郇学研究在日本具有极高声望，但在这个问题上，正如他的学生船越昭生所说：“森的《水经注》研究以表彰戴震的功绩为主旨，这是和一般认为‘戴窃赵’的多数潮流相违的。”³³因此，森的主张“是一场孤军作战”。

在中国，站在戴震一边的著名学者就是胡适(1891~1962年)。胡适是个知识渊博，研究领域十分宽广的学者。但他的后半生，却集中精力于郇学。他自己说：“我是从民国三十二年(1943年)十一月开始研究一百多年来的所谓‘赵戴《水经注》案’(又称全赵戴三家《水经注》案)的一切有关证件。”³⁴至于他为什么要研究此案，他于1952年在台湾大学文学院的一次讲学中说得十分坦率：“我审这个案子，实在是打抱不平，替我同乡戴震(东原)申冤。”³⁵胡适在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时间里，在这方面的确做了大量工作。他逝世后，他在台湾南港的寓所改为胡适纪念馆，由他的夫人江冬秀商请凌纯声、魏岳寿诸氏组成委员会，负责编印《胡适手稿》³⁶。从1966年开始，数年之中，共出版了十集(每集分上中下三册)，其中第一集到第六集计十八册，全为讨论《水经注》案的资料。在中国郇学史上，除了注疏郇注的学者以外，以郇学研究的论文函札而言，胡适实可以成果众多而冠于古人。当然，胡适的郇学研究，并不属于上述考据、词章、地理三个学派中的任何一派。正如他的学生费海玘所说：“胡先生研究《水经注》的动机，却不去治地理学，而是辨别戴震窃书的是非。”³⁷所以在古今所有郇学家中，胡适是个特例。

胡适下决心要为戴震翻案，但是由于戴、赵二书“十

同九九”，过去的许多学者，早已把戴、赵二本，加上戴自称是主要依据的大典本，作过多次核对，发现了许多戴与大典本的不同，却与赵本相同之处。在这方面，胡适已经没有声辩的余地。于是，他就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，在戴、赵二本的不同之处下功夫。他为戴震翻案的文章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《戴震未见赵一清《水经注》校本的十组证据》³⁸。因为指责戴震剽袭的人，有的认为戴在四库馆见了赵书，有的则认为早在乾隆三十三年(1768年)戴主修《直隶河渠书》时就见到了赵书³⁹。因此，胡适如能证明戴震未曾见过赵书，当然就不必再说剽袭了。他在该文中说：

这十组证据都是赵氏书里的特别优点，而都是戴氏书里全没有的。这十组或是校改了毫无可疑的错误，或是解决了不能不解决的问题，都是研究《水经注》的学者平日“寤寐求之”的好宝贝，专治《水经注》的人，见了这些好宝贝，若不采取，那就成了“如入宝山空手回”的笨汉了。

此外，他还花了很大力气，找寻其他一些可以说明戴氏未见赵书的证据。例如，他从《清高宗御制诗四集》的《汇刻四库全书联句》中，找到正总裁王际华的《联句》“局咨长贰纲都领，厅判东西力众擎”一句，下有王的自注：“校勘《永乐大典》者，于原心亭列席；校勘遗书者，于宝善亭列席。”根据这条材料，胡适就考证说：“四库全书馆分东、西两院，东院三十个翰林，西院也是三十个翰林，两院整理各自进来的遗书。《永乐大典》是东院整理的，东、西两院互相妒忌……赵一清的《水经注》由西院翰林整理，戴东原在东院，当然没有看到。”⁴⁰这段考证，实际上是从王际华的《联句》和自注中套出来的，再由他想当然地加上“东、西两院互相妒忌”的话，让人们加强两院不通声气、戴震无法看到赵书的印象。其实，四库馆的屋宇虽有东、西之分，但领导却是统一的，总纂官说一句话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。何况戴震就是奉总纂官纪昀之命进馆校勘《水经注》的，当然可以名正言顺地向西院吊阅赵书。与前面的《十组证据》相比，这种考证，就更显得徒劳无功了。

《十组证据》虽然与上述东、西两院说不同，是一篇搜

集了较多数据的文章，是在替戴震翻案这个课题上惟一尚可探索的道路。但是，由于戴、赵二书从体例到内容“十同九九”，毕竟不是这区区“十组证据”可以推翻全案的。就在胡适去世这一年，辞书学家杨家骆发表了一组抽样调查的结果。他选择全书中篇幅最小的一卷，即卷十八《渭水》为样本，以赵本、殿本、大典本、杨熊注疏本四本互相比勘，其结果是：

统计在异文一百十处之中，除杨本异文无与赵戴争端外，大典、戴校、赵释三本有异同者凡九十处，其中戴同于赵者四十三处，戴同于大典十二处，戴异于二本者三十一处，三本互异者四处，倘复就赵氏校释中谓应作某者考之，凡戴异于赵，亦多阴本赵氏校释之说，则戴之不忠于大典而复袭于赵，固至显然也。⁴¹

杨氏的抽样调查发表后，得到港、台学术界的大量附和。于大成在《永乐大典与大典学——论水经注案》⁴²一文中，盛赞杨家骆的文章，再一次强调大典本在揭露戴书袭赵中的作用。他说：“不意二百年后，大典竟自中祕散在人间，又不意大典残缺之余，《水经注》之书独全，于是，东原掠美东潜者，其迹乃无所遁逃。”

胡适为戴震打抱不平的许多文章，其结果是使这个已趋休止的赵戴《水经注》案，又一次在港、台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。许多学者纷纷撰文，对胡氏的意见予以驳斥。由于这场旷日持久的论战，实际上严重影响了郦学的发展，所以不少人已经厌烦这种论战。例如寓居澳门的学者汪宗衍所说：“惟近人胡适之晚年专治郦书版本，极力为东原洗刷剿袭，撰有论文函札七十余篇，凡数十万言，耗二十余年精力，为兹枝节问题，虽曰求是，实于郦书何干？”⁴³

胡适在郦学研究中立志要重审这个赵戴《水经注》案，其结果不仅徒劳无功，而且为枝节问题而大张旗鼓，重启战端，实在不得人心。不过他在郦学研究中也并非毫无成就，其主要成就是对于郦注版本的搜集方面。如费海玘所说：“三十五年（按1946年）胡先生回国，记者传出他研究《水经注》的话，于是上海的朋友，纷纷把见过的《水经注》告诉他，北平的朋友亦然，于是全国的《水经注》均集中

到他寓所，达三大橱之多。”⁴⁴他于1948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，在北京大学举办《水经注》版本展览，展出的各种郦注版本达四十一种之多⁴⁵。他无疑是郦学史上迄今为止搜罗版本最多的学者。

近代国内外郦学研究概况

郦学牵涉的领域甚广，诸如历史学、地理学、考古学、碑版学、民族学、语言学、文学等许多方面，都和郦学有密切的关系，郦学都可以为这些学科提供丰富的资料。

两个多世纪来，由于不幸而发生了如上所述的这场“大论战”，许多有才华的学者，都被牵连到论战之中，论战几乎代替了正常的郦学研究，严重地影响了郦学的发展。但是，值得指出的是，毕竟也有一些郦学家顶住了论战的干扰，继续从事郦学本身的研究，在这段时期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。例如范文澜的《水经注写景文钞》（北平朴社1929年出版），丁山的《郦学考序目》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《集刊》3卷3期，1932年出版），岑仲勉的《水经注卷一笺校》（广州《圣心》第2期，1933年出版），郑德坤的《水经注引得》（北平哈佛燕京社1934年出版），汪辟疆的《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》（重庆《时事新报》《学灯》副刊第69~70期，1940年出版）等等。这中间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熊会贞，他在杨守敬去世后，埋头二十余年，“无间寒暑，志在必成”⁴⁶，撇开历史上纠缠不休的赵戴相袭的旧事，继承杨氏地理学派的衣钵，把主要精力放在充实《水经注疏》的地理学内容方面。同时，在新的科学思潮的启发下，正视了旧郦学研究中的落后一面，力求刷新郦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。尽管他的最后定稿本不幸被人私卖而至今不知下落，但他留下的几种钞本，仍然闪烁着无比光彩，成为我国郦学史上的珍贵遗产。

建国以后，我国的郦学研究继续获得了发展，首先值得提出的，当然是前已论及杨、熊合撰的《水经注疏》的早年钞本之一，已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影印出版。由于这部钞本在当时钞成以后未经熊会贞的校订，以致出版后

发现错误百出。但郦学界老前辈钟凤年先生从此书出版之日起,即致力于此书的校勘工作,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,终于校出了错误二千四百余处,撰成《水经注疏勘误》⁴⁷专文,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影印本的缺陷。在北京影印本出版以后,侯仁之教授主编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》(科学出版社,1962年出版),以合校本为底本,选入了《瀑水》、《鲍丘水》、《渭水》三篇,广加注释,并配以地图,受到各方的重视。

十年灾难以后,郦学再次获得较大的发展,从各个方面研究《水经注》的成果,一时大量地涌现出来。按照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,包罗的方面甚多,已经初步出现了一种研究的热潮。对郦注做全面介绍的文章,有曹尔琴的《郦道元和水经注》(《西北大学学报》1978年第3期)和张大可的《水经注》(《文史知识》1981年第6期)等,这类作品,即使对郦学界以外的广大读者,也有推广介绍的作用。

对于郦道元的出生年份和籍贯,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,也出现了一系列各抒己见的文章。辛志贤的《郦道元籍贯考辨》(《山西师院学报》1982年第2期),赵永复的《郦道元生年考》(《复旦大学学报》历史地理增刊,1980年),刘荣庆的《郦道元遇难地小考》(《人文杂志》1982年第4期)等等,较之前人的考证,都有所发展和创新。

论述郦道元思想的论文也屡见发表,其中谭家健的《郦道元思想初探》(《辽宁大学学报》1983年第2期)一文,对郦道元的长期不为人注意的、甚至被误解的许多积极的思想倾向和进步哲学观点,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。拙作《爱国主义者郦道元与爱国主义著作水经注》(《郑州大学学报》1984年第4期)一文,则从郦氏在南北分裂的环境中,却以祖国统一的思想撰写此书,并且热情地赞美祖国各地的山水,论述了郦道元的爱国主义思想,并说明《水经注》一书不仅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,作为一部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读物,也值得推广评介。

对于《水经注》本身的研究,这一时期也有较大的发展。章巽教授所撰的《水经注和法显传》(《中华文史论丛》,1984年第3期)一文,纠正了《水经注》对今新疆境内到印